

与早年的一位文友聊天,他向我荐读冯增荣的散文集《生之痕》。冯老是我熟识的一位文学前辈,早年我读过他的诗集《感情的风》,后来在报刊上读过他发表的一些诗文。

我怀着莫大的好奇,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此书。书很普通,32开本,分前后两集,分别由中国文联和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前集淡黄色的封面,恰似随意涂抹的一堆水墨画面上,腾空飞起一只蝴蝶,煞是好看;后集淡紫色的封面上,是一帧作者的生活照,蓬乱的头发,反剪着双手,微蹙着双眉正神情凝重地注视着。

前集书出版于1999年,与后一集相隔八年。整部书收集作者晚年写的114篇文章,大都是回忆他年轻时参加革命的经历与往事,还有怀念战友、同道的篇章,以及应邀撰写的序文散章。翻阅这部书,让我看到了冯老年少奔走抗日救亡时活跃的身影,还有追求理想与真理、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事业的青春年华。

爱的天性

唐燕能

新居坐落在青山绿水环抱的小山坡上,暂名:半山草堂,取米芾字体复刷一匾,悬于书斋茶室的西墙上。茶室东侧是一排落地钢窗,透过纱帘,可见一方庭院,一百平方米左右。庭院东边与南边,沿墙砌了一道曲尺型的花坛,上面依次种了美人蕉、蓝梅树、茶树、凤尾松、翠竹与蔷薇花;北侧与茶室前面,围有中式栏杆,庭院中间砌了一个正方形的花坛。新居的样式虽然中西合璧,但此处庭院,南墙旁翠竹瑟瑟,似有潇湘馆的况味。于是,正中的花坛上种了两株芭蕉,一株长得纤弱,似母亲;一株长得高大壮硕,似父亲,再配上一块从贵州运来的玲珑石,算定当了。

芭蕉树桩矮矮的,圆鼓鼓,去年早春,两段树桩栽上,总不见长,于是天天浇水观察。一日清晨,只见松树的树桩上嫩绿的树梢头冒了出来,酷似大葱。它活了,心中好生喜欢!

两株芭蕉树长得很快,月余便成形了,每株长出四五片绿叶,且日长夜大,到了夏天,竟至一丈多高。次年,那株“芭蕉母亲”四周长出了五株小芭蕉树,像五个顽皮的小孩围着母亲撒娇,那几片叶子拔浪浪鼓鼓的晃动,十分有趣。那株“芭蕉父亲”长得又大又高,就像一个大力士,高高在上,伸展着五六片阔叶,为“母芭蕉”和小芭蕉遮风挡雨,一派豪迈气概!仰望绿叶翠盖,令人肃然起敬!伟哉,丈夫也!

春去冬来,芭蕉过冬,必须把树桩剪断,套上塑料袋,方可确保安然无虞。经严寒肃杀,又过一年,那株壮硕的芭蕉却不见长,像刚出土的兵马俑,露了半截蓬头垢面的头颅,上面有一个发髻状的顶盖——它死了。邻居说,正方形的花坛,空间小,山泥不多,养分少,为了确保“母芭蕉”与小芭蕉有足够的养分,它“决然赴死”了。

然而,随着东南西北拱卫“母亲”的小芭蕉的长大,那株“母芭蕉”油油的鲜绿色叶片,渐渐枯萎、凋残,顶部只剩下如意状的一根肉柄,弯弯的,低垂着,待花序的下端,米粒似的白花一层层脱落,散尽,“母芭蕉”也就死了。

“母亲”的生命换来了五株小芭蕉的茁壮生长,其中朝北的一株长得酷似死去的“芭蕉父亲”,巨大的阔叶向蓝天伸展着,凛凛然,像父亲保护着自己的妻儿一样,照应着自己的亲弟弟。

有道是“一草一木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自然界,天地间充盈着大爱,天地无垠,爱的天性无处不在。

冯老笔名真虹,浙江温州人。出生于1925年冬月,是一位较早参加地下革命的老诗人,著有《感情的风》《真虹诗选》《真虹小诗》等诗集。我与他结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年劫后余生的他,本来完全可以安排一个领导职位,但他弃政从文,主动请调浙江省文联,负责筹建东海文艺出版社,并参与创办《江南》大型文学期刊。

这年的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枫叶,在历经霜降和秋雨的洗礼后,迎着雨后的太阳,愈发显得红艳欲滴。冯老会同诗人蒋荫炎、周孟贤,散文家王瑞芳、费淑芬等一行十余人,组成浙江省作协采风团到浙南有名的全国先进单位——石垟林场采风。我作为地方文化馆的创作干事,前往协助接待和陪同他们。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黄毛小伙,肩上斜挎着一把古木吉他,奔走于他们之间,忙前忙后。记得我与湖州诗人周孟贤,还有有多谊之情的冯老混得最

熟。我们深入林区采风,召集林工座谈;徜徉于林间小径,畅谈人生理想……关于这一段记忆,冯老在书有所提及,但没有详细的记录。我依稀记得,冯老当时写了好几首诗,还即兴在联欢会上朗诵过。他专门采访了林场的党委书记朱隆重,写了诗歌《书记的泪》和散文《大山的儿子》。临别林场时,他挥舞着手中的采访本说:“此行,收获很大。这里的人与水都不混浊,堪称天人合一的心灵之旅。”

夜半时分,万籁俱寂,高悬的明月映照着大地。我一边回想着往事,一边在台灯下读着冯老的书。后一集书读到过半,竟然在图片插页中发现当年所拍的一张集体合影。这张照片不知何人所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或许就是前面文友所说的读《生之痕》赐予我的一个意外之“惊喜”吧。

在一个林区的场院,采风团人员分成两排,或站或坐,竟挨得那么近,背身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仔细端详,照片上的冯老刚好是我现在的年纪,浓密的头发四六分开,深陷的眼眶目光炯炯,透发着诗人特有的气质。再瞧那附的我,多么的年轻啊,身穿一身绿军装,留着一头当年年轻人最流行的李小龙经典港式发型,就差仰头往后那么一甩啦!

日月奄忽,我与冯老已经多年没有联系。当我几经周折找到如今已步入鲐背之年的他,彼此谈到当年见面的情景,是多么的欢愉啊。晚年的冯老,在北京与杭州两地居住,写诗画画,习字爬山,寄情于

多了许多亲情。有一段时间,他每年冬天都来北京避寒。我曾两次和朋友一起去他的寓所探望。记得临告别时,他还各送一包糖果给我们。接受这样的礼物,又让我有回归童年的快乐和惊喜。

还有一次,他来我居住的小区,去看望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老作家柯岩,柯岩邀我陪坐。记得那一天谈到将近黄昏,我们想给他叫一辆出租车,他执意不肯,坚持要坐公交车。我只好领他去公交车站,直到送他上了车,目送车开走了,我才转身回家。那时天色已晚,我一直有些不安。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每一次会面谈话,他都会谈到“为小

子写大文学”这个话题。他发之于至诚、至真,出之于自然、热切。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过。他的这句话深入人心,影响着儿童文学界。我首先从阅读开



仿松雪笔意 (中国画) 郑伯萍

翰墨之中,闲步于山水之间。他裁了一小截宣纸片儿写信给我,台头一句“晓春老友”,让我顿然热泪盈眶。他信中说:“你捧着吉他自弹自唱的形象始终存留在我脑中。”

冯老的一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他打小就喜欢文艺,11岁发表处女作。他在政治上早熟,13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4岁加入中共地下党,16岁担任温州城区区委书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1958年蒙冤入狱,在劳改场耗去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22年,直至1980年沉冤昭雪。

他大起大落的人生历程,就像蜿蜒奔腾的之江——钱塘江,拐了一个大大的“之”字。

对于所受的冤屈与磨难,冯老从来不说一句怨言。即使是身陷囹圄,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他仍然坚持阅读马列著作,系统地自学农业化学知识武装自己;他不服罪拒绝穿戴犯人服饰,但在工位上却仍然拼命劳作而成为劳改队生产骨干;为抵御精神上的孤寂,他在枕头上画键盘,彻夜弹唱心中高亢激昂而不能发声的命运交响曲……

那么,到底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使他走过了如此坎坷而艰难的人生之路呢?这是当年年少的我,心里埋下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事隔三十多年以后,当我捧读冯老晚年所作的这部《生之痕》时,才恍然大悟:他之所以在逆境中能够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是因为对组织坚定的信念;二因为是对脚下

这片厚实的土地怀有一种特别的爱。正如艾青诗中所写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生之痕》是冯老用生命体验的血与泪抒写的一部人生史书。全书充满着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它告诫汲取历史教训,又激励后来者奋发向前。在《请收下我火烫的心》的诗中,冯老深情地说:“如果我是泪珠/凝聚着一代悲欢,一身坎坷/我愿升华为雨露/把原野和群山关注/即使汇成苦涩的海洋/也要将洁白的浪花飞舞……”

在为《历史的磨难与钟爱》一书所作的序中,冯老这样写道:“对于生活中畏首畏尾的弱者,亏待就是摧残;而对于无愧于心的强者,摧残往往变为难以求致的磨难,甚至是一种别样的造就。”冯老的人生本身即一部历史的大书,他自己就是一位无愧于心的强者,一位坚定的革命者,过去的磨难使他成为时代的见证者,现在的反思又使他成为历史最虔诚的倾听者。他用生命与文学铸就了自

己别样的人生。人生之惊喜,莫过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凡此种种,现如今于我,又多了一种:老之将至时,在一本书中发现过去曾经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模样,从而让我有幸见证一位初心不改、历经风雨的坛宿者倾其一生的担当与守望!

我都会和他私相款语:我不是写得更好一些了?我长大了,变老了,我的文学是否也长大了些,成为了给儿童的那种“大文学”了?

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获奖作者,当你领取这份荣誉和快乐时,你就是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文学”的红地毯。

你是走向一种新的召唤,许下一个新的诺言:一代代孩子在长大,我的一本书也在长大,我和我的书,会走进“大文学”的光照之中。

他让我这个穷大学生一家人,安然地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

观友人画 (二首) 陆加梅

江南端是旧家园,水墨沈吟自有源。莫道秋寒前路远,霜头红叶照明轩。

不是逢人便说国,云山肆意得清源。胸中逸气窗前酒,闲闭柴门坐小轩。

短短一个礼拜,原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征集部研究员王毅已经三趟光顾银行博物馆,比“老娘舅”跑得还勤快。他学“蚂蚁搬家”,将家藏多时的老银行支票册、票据夹、储蓄书签、有奖储蓄存单、信用合作社股票等文物,林林总总40余件,分三次送来,其中的上海解放初期肃清银元投机宣传标语,难得一见,镌刻了一场惊心动魄、没有硝烟的“金融保卫战”史实;集藏甚丰的媒体人方翔“梅开二度”,近日又在网上搜罗到一枚正义商业储蓄银行与某家商号的对账清单,揭示了一段民国沪上小银行难抵“金融风潮”半年赔光家底的失败案例,颇具警示意义,立马解囊购下,随手捐出;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罗东平,之前就多次捐送金融纸杂文献,包括1949年整套《经济周报》,还古道热肠,牵线搭桥动员藏友捐物,这回读了“夜光杯”,再次捧来1962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等教材典籍……

收藏使人快乐,捐赠使人满足。诚如民国“钱业领袖”之孙允宗读报后有感而发:“……《捐物长宜放眼量》一文,列举我的捐赠情况,实感惭愧,也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你做点有意义的事,常被人念念不忘,也是人生一大追求也。”

走近陈伯吹先生 金波

始印证他的这句话。我发现那些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写成人文学的作家,他们都为孩子写出过经典之作,确实是

陈伯老一生对儿童文学的贡献,影响着我们几代作家。他不仅在心灵上贴近儿童,而且作为一种修养,同样影响着我们。

是的,我的每一次获奖,都是一次离陈伯老更近的时候,

谁说纸媒式微?拙作《捐物长宜放眼量》在“夜光杯”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朋友读报之余,即给笔者打来电话或发来微信,对文中提到的捐赠人表示由衷的敬意。一周之内,又有四五位热心市民触“金”生情,翻出家藏金融旧物,有的甚至怀揣当天晚报的版面,赶来银行博物馆捐献,前后计有50余件,其中不乏稀见珍品,令我感动不已。

年逾八旬的国画大家戴敦邦因右眼失明,阅读晚报,一般在隔日上午阳光充足之时。见报翌日,文中提及的捐赠者、资深出版人杨柏伟登门造访戴先生,老爷子手持报纸,喜出望外:“正巧,我从阿海文章里看到依的爱心之举,我空时也要寻寻看,有啥银行旧物事可以捐给他们。”其实,戴老爷子前些时候已向银行博物馆捐出大尺幅的《生财有道图》。探探市场行情,戴先生画价不菲,但他坚持不卖画,只捐画,常年投身慈善公益,淡泊名利,德艺双馨。他回忆道,“30多年前,我家住在博物馆附近的永年路223弄,一拿到连环画稿费,就是存进这里的(银行博物馆现址原为工行复兴中路支行),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银行是管钱的地方,我让画中文一武两位财神留在此地,交关放心。”

海内存“字迹”,天涯若比邻。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张国康,年高德劭,学深笔健,人称金融老法师,10多年退休后,一直旅居纽约,时常撰写金融钩沉之作,供稿银行博物馆馆刊。此番他通过新民晚报美国版,读到众多慷慨人士的捐赠故事,百感交集,随即找出当年入职时打算盘、抄账页、搬机具等珍贵照片,附上情真意切的文字记述,借助微信发送过来。他再三表示,待疫情散尽,重返故土,一定将满载青春印痕的昔时银行文献资料及私家相册原件送至博物馆,让其充分发挥“活化资源、讲好故事”的作用。

短短一个礼拜,原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征集部研究员王毅已经三趟光顾银行博物馆,比“老娘舅”跑得还勤快。他学“蚂蚁搬家”,将家藏多时的老银行支票册、票据夹、储蓄书签、有奖储蓄存单、信用合作社股票等文物,林林总总40余件,分三次送来,其中的上海解放初期肃清银元投机宣传标语,难得一见,镌刻了一场惊心动魄、没有硝烟的“金融保卫战”史实;集藏甚丰的媒体人方翔“梅开二度”,近日又在网上搜罗到一枚正义商业储蓄银行与某家商号的对账清单,揭示了一段民国沪上小银行难抵“金融风潮”半年赔光家底的失败案例,颇具警示意义,立马解囊购下,随手捐出;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罗东平,之前就多次捐送金融纸杂文献,包括1949年整套《经济周报》,还古道热肠,牵线搭桥动员藏友捐物,这回读了“夜光杯”,再次捧来1962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等教材典籍……

收藏使人快乐,捐赠使人满足。诚如民国“钱业领袖”之孙允宗读报后有感而发:“……《捐物长宜放眼量》一文,列举我的捐赠情况,实感惭愧,也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你做点有意义的事,常被人念念不忘,也是人生一大追求也。”

我都会和他私相款语:我不是写得更好一些了?我长大了,变老了,我的文学是否也长大了些,成为了给儿童的那种“大文学”了?

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获奖作者,当你领取这份荣誉和快乐时,你就是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文学”的红地毯。

你是走向一种新的召唤,许下一个新的诺言:一代代孩子在长大,我的一本书也在长大,我和我的书,会走进“大文学”的光照之中。

他让我这个穷大学生一家人,安然地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

我都会和他私相款语:我不是写得更好一些了?我长大了,变老了,我的文学是否也长大了些,成为了给儿童的那种“大文学”了?

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获奖作者,当你领取这份荣誉和快乐时,你就是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文学”的红地毯。

你是走向一种新的召唤,许下一个新的诺言:一代代孩子在长大,我的一本书也在长大,我和我的书,会走进“大文学”的光照之中。

他让我这个穷大学生一家人,安然地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

善举是可以传递的

黄沂海

谁说纸媒式微?拙作《捐物长宜放眼量》在“夜光杯”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朋友读报之余,即给笔者打来电话或发来微信,对文中提到的捐赠人表示由衷的敬意。一周之内,又有四五位热心市民触“金”生情,翻出家藏金融旧物,有的甚至怀揣当天晚报的版面,赶来银行博物馆捐献,前后计有50余件,其中不乏稀见珍品,令我感动不已。

年逾八旬的国画大家戴敦邦因右眼失明,阅读晚报,一般在隔日上午阳光充足之时。见报翌日,文中提及的捐赠者、资深出版人杨柏伟登门造访戴先生,老爷子手持报纸,喜出望外:“正巧,我从阿海文章里看到依的爱心之举,我空时也要寻寻看,有啥银行旧物事可以捐给他们。”其实,戴老爷子前些时候已向银行博物馆捐出大尺幅的《生财有道图》。探探市场行情,戴先生画价不菲,但他坚持不卖画,只捐画,常年投身慈善公益,淡泊名利,德艺双馨。他回忆道,“30多年前,我家住在博物馆附近的永年路223弄,一拿到连环画稿费,就是存进这里的(银行博物馆现址原为工行复兴中路支行),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银行是管钱的地方,我让画中文一武两位财神留在此地,交关放心。”

海内存“字迹”,天涯若比邻。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张国康,年高德劭,学深笔健,人称金融老法师,10多年退休后,一直旅居纽约,时常撰写金融钩沉之作,供稿银行博物馆馆刊。此番他通过新民晚报美国版,读到众多慷慨人士的捐赠故事,百感交集,随即找出当年入职时打算盘、抄账页、搬机具等珍贵照片,附上情真意切的文字记述,借助微信发送过来。他再三表示,待疫情散尽,重返故土,一定将满载青春印痕的昔时银行文献资料及私家相册原件送至博物馆,让其充分发挥“活化资源、讲好故事”的作用。

短短一个礼拜,原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征集部研究员王毅已经三趟光顾银行博物馆,比“老娘舅”跑得还勤快。他学“蚂蚁搬家”,将家藏多时的老银行支票册、票据夹、储蓄书签、有奖储蓄存单、信用合作社股票等文物,林林总总40余件,分三次送来,其中的上海解放初期肃清银元投机宣传标语,难得一见,镌刻了一场惊心动魄、没有硝烟的“金融保卫战”史实;集藏甚丰的媒体人方翔“梅开二度”,近日又在网上搜罗到一枚正义商业储蓄银行与某家商号的对账清单,揭示了一段民国沪上小银行难抵“金融风潮”半年赔光家底的失败案例,颇具警示意义,立马解囊购下,随手捐出;上海收藏家协会会员罗东平,之前就多次捐送金融纸杂文献,包括1949年整套《经济周报》,还古道热肠,牵线搭桥动员藏友捐物,这回读了“夜光杯”,再次捧来1962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会计核算》等教材典籍……

收藏使人快乐,捐赠使人满足。诚如民国“钱业领袖”之孙允宗读报后有感而发:“……《捐物长宜放眼量》一文,列举我的捐赠情况,实感惭愧,也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你做点有意义的事,常被人念念不忘,也是人生一大追求也。”

我都会和他私相款语:我不是写得更好一些了?我长大了,变老了,我的文学是否也长大了些,成为了给儿童的那种“大文学”了?

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获奖作者,当你领取这份荣誉和快乐时,你就是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文学”的红地毯。

你是走向一种新的召唤,许下一个新的诺言:一代代孩子在长大,我的一本书也在长大,我和我的书,会走进“大文学”的光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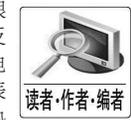
他让我这个穷大学生一家人,安然地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

我都会和他私相款语:我不是写得更好一些了?我长大了,变老了,我的文学是否也长大了些,成为了给儿童的那种“大文学”了?

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获奖作者,当你领取这份荣誉和快乐时,你就是踏上了一条通往“大文学”的红地毯。

你是走向一种新的召唤,许下一个新的诺言:一代代孩子在长大,我的一本书也在长大,我和我的书,会走进“大文学”的光照之中。

他让我这个穷大学生一家人,安然地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



十日谈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责编:刘芳